

# 侠客的身体:金庸武侠小说身体叙述策略研究

寇鹏程

(西南大学 文学院、侠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715)

**摘要:**金庸小说中侠客的身体叙述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第一是在“武功”与身体方面,取消了简单的强弱对应;第二是在“美”与身体方面,通过女侠叙事促进了武侠领域的女性解放;第三是在“善恶”与身体方面,断绝了身体与“善恶”的简单对应;第四是通过“易容换面”之术的频繁应用,以身体形象的变化产生了多方面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身体叙事;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6-0040-04

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对于侠客来说尤其如此,侠客的身体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一个令人憧憬的课题。本文以金庸小说为研究核心,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目前金庸小说研究已蔚为大观,但对其身体叙述少有专门研究。舒斯特曼说:“身体本来是我们思考与行动最根本的载体,但是如果去关注身体本身的感觉与运动,长久以来却一直批判为有害的走向与道德的沦落。”<sup>[1]</sup>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的深入,身体的觉醒与“敞开”成为一个现代性事件,各种身体研究日益活跃起来。在此背景下,金庸小说身体美学研究就更加具有必要性了。金庸小说在身体叙述上具有明显的策略性,本文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 一、“弱”的身体

金庸小说身体叙事最常用的策略是以“弱”写“强”,这种叙事颠覆了人们对侠客身体的惯常想象,增加其不可预测性,大大解放了侠客的身体,让高强的武功不再仅仅寄身于“相貌堂堂”的躯体之中,各种身体形象都和武功产生了紧密联系,增加了读者与侠客身体之间的陌生感与距离感,使身体和武功之间的关系每每产生意想不到的震惊效果。武功的高低与身体的“高大强壮”没有必然联系,相反,那些“肌肉猛男”往往是武功较低甚至不堪一击的。《书剑恩仇录》(本文中金庸笔下侠客的身体形象均引自三联书店《金庸作品集》1994年版,以下不再注明)中的忽伦大虎、二虎、三虎、四虎这四个“巨人”,扑向一个“文弱”书生陈家洛,却被陈家洛打得满地找牙。如果自恃天生“身体好”就想凭蛮力纵横江湖,只能是痴人说梦,身体上的“大手大脚”是最低层次的。武功真正高强的侠客往往瘦小斯文,甚至老弱病残,他们以“柔弱胜刚强”的深刻反差,使身体世界变得曲折起来,在对身体这种惊讶的“延宕”中获得多重审美享受,身体美学上升成为“身体哲学”。金庸小说中侠客身体“弱”的表现有四种:

第一是矮小瘦弱的身体。这似乎与高超武功无缘,但在金庸那里却偏偏武功高强,这种打破读者惯常思维的“陌生化”策略,在金庸小说中十分常见。矮小瘦弱的侠客很多,《天龙八部》的慕容博,《倚天屠龙记》少林寺看守谢逊的三老渡厄、渡难、渡劫,《白马啸西风》的“一指震江南”华辉,《书剑恩仇录》乾隆

\* 收稿日期:2010-09-02

作者简介:寇鹏程(1972-),男,四川达州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现代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谱系与文学实践研究”(10YJA751032),项目负责人:寇鹏程。

身边“枯瘦矮小”的“金爪铁钩”白振等，都是矮小瘦弱而身怀绝技。金庸大量使用了这一叙事策略，在其作品中十分普遍，说明这是一种自觉的叙事机制。这种叙事策略断绝了身体与武功之间的简单对应而让人不敢“以貌取人”，解构了日常定式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侠客的印象，使侠客世界增添了一份神秘。

第二是残疾缺废的身体。成为大侠并不一定需要身体素质的“天生异禀”，残疾缺废同样可以成为武林高手。这也是金庸处理侠客身体的一个叙述策略，同样是以强烈反差来丰富侠客的身体。残疾缺废的武林高手很多，如洪七公、杨过、金毛狮王、冯默风、梅超风、木高峰、柯镇恶、阿紫、陆无双等。侠客们残而不废，残疾人同样可以独霸一方，练成独门武功。被打入公孙止炼丹房下鳄鱼潭的“铁掌莲花”裘千尺，手足筋脉全被挑断，最终以嘴为武器，以枣核为工具，练成了杀人于无形的“吐枣功”，重见天日，夺回“谷主”宝座，把身体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展示了“侠”在身体强悍之外的无限令人神往的空间。

第三是疾病缠身的身体。一些武功高强的侠客却总是病怏怏的，《笑傲江湖》衡山派掌门人“潇湘夜雨”莫大先生、《雪山飞狐》“金面佛”苗人凤、《飞狐外传》“韦陀双鹤”之一刘鹤真、《侠客行》“着手回春”贝海石、《鹿鼎记》海大富等，都总是“一副病象”。武林高手却“满脸病容”，人们对身体与武功之间的诡谲关系不敢轻易下判断。病怏怏的身体与惊世骇俗的武功结合在一起，出乎意料地消解了读者的习惯思维，增添了侠客武功的神秘莫测感和身体的吸引力。这些侠客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使得侠客叙事亲切化、日常化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叙述”。这些日常可见的“平常身体”与“不平常”武功之间的关系，让读者在熟悉中品味陌生，觉得这些侠客既近又远，伸手可触却又遥不可及，英雄凡人化，凡人英雄化，产生了很好的美学效果。

第四是与“武”相对的“文”。金庸笔下有很多“书生”侠客，书生的惯常形象是斯斯文文的，与侠客相去甚远，但在金庸笔下偏偏是侠客，外表清雅而武功高强，让人不敢小视。《书剑恩仇录》中的余鱼同、陈家洛，《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射雕英雄传》“江南七怪”之一朱聪，《倚天屠龙记》打扮成书生模样的殷素素等，都是书生型侠客。书生的文雅外表与强悍功夫形成鲜明对比，让侠客的身体又一次变得让人震撼，身体的层次更丰富曲折，“文”与“武”以身体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好处是引起读者的惊叹之情，以反差使读者不由得“停顿”一下，调动读者积极阅读的主动性、创造性。武功对身体的“背叛”所产生的张力，大大激活了对侠客世界的超越性想象，身体不再是武功的直接表意符号而有了“文学功能”，成了对压抑的反抗与自由的叙述。这些“反常”的叙述，既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建构，解构惯常的简单对应，建构新的复杂关系，既是对武侠神秘性的解构，又因身体与武功之间的不对称建构了新的神秘。

当然，身体本身的高大威猛自然是侠客的先天优势，更容易在江湖立足，俗话说“一力降十会”，强壮身体与高超武功的“强强联合”自然更有大侠风范。虽然身体本身的先天条件并非成为侠客的前提，但金庸也不会刻意回避、抛弃高大威猛在侠客身体中的地位，如果那样反倒不真实了。金庸笔下高大威猛型的侠客也相当多，这使侠客的身体叙述显得更自然真实。如《天龙八部》中的乔峰，《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黄药师、欧阳锋，《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谢逊、莫声谷、静玄师太，《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等，都是魁梧异常。高大魁伟型是金庸众多侠客正常身体形态的一种，是一种正面叙事，是一种明写、实写，相当于“破”中之“立”、“逆”中之“顺”，顺应了读者对侠客身体的惯常想象。有正有反，有破有立，叙事层次因而更丰富。

## 二、“美”的身体

侠客身体叙事中的最耀眼之处是大量的女侠，女侠在江湖的行走使侠客的身体世界变得万紫千红，改变了侠客身体世界的结构。林保淳说：“从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而言，女性侠客的出现，整个影响到江湖结构上的体质改变，主要是注入了柔情的因素，这不但使得江湖的阳刚气息得以藉柔情调剂，更连带影响及英雄侠客的形貌与性格的描绘。”<sup>[2]</sup>大量女性美丽迷人的身体，改变了侠客世界男性主宰的身体结构，减缓了紧张的气氛，多了一层浪漫色彩。女性在金庸小说中是真正独立的侠客，而不是装饰的“花瓶”，不是武侠世界的“她者”，不是单纯用来“养眼”的性别的唯美，不是用来“被看”吊人胃口的男侠客的陪衬。女侠甚至比众多男侠还要有魅力，不再是边缘而是中心。金庸花费大量笔墨描写这些女侠客柔

美身体里的无限能量,叙事重心向女性倾斜,“女儿国”在武侠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金庸对武侠小说叙事转变的巨大贡献。

美女型侠客如小龙女、黄蓉、王语嫣、霍青桐、任盈盈、赵敏、周芷若、殷素素、温青青、袁紫衣等,个性鲜明,形象丰满。既然是美女型侠客,自然要有万种风情,在这些柔美的身体之中,高强的武功、善良的心灵与智慧的头脑完美结合,让读者赏心悦目,如痴如醉。女侠身体的美也不尽相同,如小龙女秀美绝俗,“洁若冰雪”,白衣飘飘,行走江湖,万众瞩目;霍青桐“翠羽黄衫”,“光彩照人”,纵横千里,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女侠,痛快淋漓;袁紫衣骑白马,穿紫衣,风驰电掣,何等艳丽俊美,身体色彩的鲜艳达到了极致;任盈盈这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容貌秀丽绝伦”,却是江湖人人闻风丧胆、顶礼膜拜的“圣姑”。在紧张的江湖斗争中,这些美丽女性的出现缓和了气氛,使叙事一张一弛,节奏错落有致。

还有一位特殊的不是侠客的女侠客,这就是王语嫣,她不会武功却行走江湖,这并非只是为了给全书增添美色“佐料”的“插曲”。王语嫣虽然不会武功,却胸罗万有,武学造诣高深,对各门武功的套路、渊源、优劣了如指掌。段誉要她“指点”自不必说,连“南慕容”也要受她指点,当真是武林一绝,堪称“奇侠”。王语嫣是叙事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装饰勉强写进去的,是金庸的一处妙笔。作者对所有这些女侠的身体之美抱着礼赞的态度去描写,她们并不是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她们比很多男性还要有光辉。金庸小说里的女性,从穿着打扮到整个故事都是古典唯美的,发乎情,止乎礼,不是男性中心主义想象的欲望女性或“被看”的女性,杜绝了在身体上的低级趣味与粗俗气息,成为较纯粹的叙事需要与美学需要,使侠客的身体世界多了一种圣洁的美丽,成为武侠世界最美的风景。把美女与武侠结合得如此生动自然,给我们无限的想象、愉悦与美感,这是金庸小说最成功的魅力所在。自金庸小说的女侠叙事开其端倪,到大陆新武侠中女性武侠的“女性视角,女性从被动者走向主动,从欲望客体成为叙事主体,女性第一次真正成为武侠小说的第一主人公”<sup>[3]</sup>,是对女性的一次武侠大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也不能否认,金庸小说中总是“梦中情人”一样的美丽女侠,某种程度上也是男性眼光中对女性的另一种“想象”叙述,也有一定的“美化”因素。

### 三、“善恶”的身体

金庸小说侠客身体叙述的另一个策略是斩断了身体与善恶之间的单一定向关联,使善恶和身体之间失去了必然联系而变得复杂起来,不再是简单的好人好貌的“道德身体”。金庸在侠客的身体叙述中避免了简单的善恶对应与叙事者直接的道德“评述”,没有直接充当“审判官”的角色,这使得叙事视角更隐蔽,叙事更自由,人物形象可塑性更强。而且,这种叙事让读者产生的感情不是那种单纯的情感,而是混合的复杂情感。这种手法在金庸那里用得很多很纯熟。

在金庸对侠客的身体叙述中,当然也有恶人与恶相的对应。比如“四大恶人”,岳老三身体长得一副恶相,云中鹤“一张脸也长得吓人”,段延庆始终像个“僵尸”。但这种恶人恶相的对应,在金庸那里不是主要的,大量恶人长得非常美丽,善恶美丑之间产生强烈反差,给读者极大的冲击。梅超风、李莫愁、欧阳克、杨康、岳不群、何铁手、叶二娘、蛛儿、马夫人、丁春秋等,男的儒雅,女的娇美,善恶与身体形象之间形成了多重的错综复杂关系,去除了符号化的模式,身体信息具备了多重隐喻性,读者有了更多回旋想象的余地,因而更有审美价值。更进一步就文化伦理而言,“在某些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下,由于社会公正的缺失,黑社会就和一些亚文化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有限度和有条件的‘私力救济’方式,并因此而被美化”<sup>[4]</sup>,金庸小说身体叙述的善恶反转与侠文化的善恶反转形成同构对应,这就避免了全知全能的伦理判断,在叙事伦理边界的模糊中获得了更好的叙事与审美效果。

斩断身体和善恶之间必然联系的叙事还有一种,侠客的身体本身是模糊的,其武功出神入化,天下皆知,但身体却没有交代,留下无限“空白”与想象空间,等待读者来“具体化”。这些侠客的身体如何“强”、如何“善”等等,成为一个个“召唤结构”,烘云托月,虚实结合,上升为一种叙述策略。陈近南、郭靖、杨过、张无忌、慕容复、令狐冲、谢烟客等,身体形象都比较模糊,没有什么具体详细的描绘,只能从只言片语中想象他们的“高大强壮”。这些“身体空白”型侠客延缓了叙述时间,增添了阅读曲折,金庸笔下

不少侠客的身体都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大量重要侠客的身体叙述如此简单,绝非作者疏忽大意,而是叙述策略之一。最主要人物的身体“空白”犹如中国书画里的“留白”,相当于“暗”写、“虚”写,举重若轻,像磁石般吸引读者自己去完善、补充、丰富和想象,在虚实相生中形成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充分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欲罢不能,余味无穷。

#### 四、“易容换面”的身体

金庸小说身体叙述还有一种策略,是本来波澜不惊的身体形象而通过面具、易容术等乔装改扮的频繁使用,通过前后出人意料的变化,超越读者的“期待视野”,呈现大吃一惊的效果。本来平淡的身体就成了悬念,变得新鲜刺激,不再是平铺直叙,身体形象本身成为情节。黄蓉、程英、殷素素、赵敏、阿朱、任盈盈、温青青、袁紫衣、李沅芷、金花婆婆等,都曾经易容换面过。在江湖上怕人认出或是为了行走方便,特别是女性,乔装改扮本来不足为奇,但金庸笔下却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或怕仇人认出,身体形象本身的变换牵动着读者认知的惊讶,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但又是具有“合理性”的。更重要的是,这本身成了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产生了自然又奇妙的震惊效果,成为读者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和最吸引读者的高潮之一。

黄蓉从“乞丐”变“美女”,程英从“丑女”变“美女”,金花婆婆揭下一层面皮之后竟是“武林中第一美人”,“形状极是怕人”的小昭原貌却是“秀美绝伦,容貌艳丽”。通过这些颇具戏剧性的处理,使读者产生了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的感情,真不知她们下一步还会不会变,还会变成什么样子,读者再也不敢就此得出定论,简单的身体形象竟也成为悬念了,在这种看似“不可靠”的叙事中,大大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印象。而且,金庸这种易容换貌的身体叙述并不仅仅是为了调动读者的想象,他还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身体形象的改变也就是人物性格另一面的流露,人物形象因此变得更丰满。更重要的是,金庸身体叙述的这种“易容换貌”本身就是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动都常常靠身体的“易容”来完成,使得身体形象的改换具备了本体性功用,绝非可有可无。最有代表性的是《天龙八部》中的阿朱,整个情节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事迹都建立在其身体形象神乎其神的易容换面之上,身体的易容之术成了《天龙八部》整个故事情节向前推进的重要推进器。作者借用侦探小说的叙事机制,让读者在“破译”阿朱身体秘密、辨认隐秘的身体之时紧张而激烈地进入到故事之中。这时的身体叙述,既是一种视觉叙述,也是一种情节叙述。

金庸通过身体“聚焦”方式的多样化,尽可能增加叙事层次,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通过这些丰富的叙述策略,延缓了简单身体交代的节奏,增加了身体叙事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展示了身体的变化,使侠客的身体本身成为一种叙事,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这种身体叙事不仅和武功、情节等联系在一起,更是成功塑造鲜活人物形象的必备环节,避免了雷同,增强了个性,把侠客从类型化通俗形象提升为丰满的文学形象,是金庸小说的一大成就。金庸小说身体叙述上的匠心、技巧与艺术性,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类品格,使之在情节的传奇性、武功的深奥性、侠义精神的感染性、文化的浸染性、人情世态的现实性等等之上,开拓了武侠小说的空间。严家炎说:“金庸小说的成就,是吸取了‘雅’、‘俗’双方的文学经验因而又是超越‘雅’、‘俗’之上的。”<sup>[5]</sup>金庸小说的文学性成就是卓越的,其身体叙事策略就是这种卓越文学性成就的表现之一。

####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Shusterman. *Body Consciousness: 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sthe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
- [2] 林保淳. 儿女情长入江湖——古典小说中的女侠形象[M]. 台北:里仁书局,2003:153.
- [3] 韩云波. 论 21 世纪大陆新武侠[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150-156.
- [4] 韩云波.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中国侠文化负面批判[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5-39.
- [5] 严家炎. 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130-134.